

社会主义教育报告会报告之一

我国肃反斗争的成就 和今后的任务

罗 瑞 卿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会主义教育报告会报告之一
我国肃反斗争的成就和今后的任

罗 瑞 卿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晋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1/32 1印张 17,000字

1958年1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

统一书号: 3009·70

定价(5)八分

社会主义教育报告会报告之一

我国肃反斗争的成就 和今后的任务

(1957年12月4日在中共中央
直属机关俱乐部的报告)

罗 瑞 卿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編者的話

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屬机关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委员会宣传部，在机关反右派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以后，认为有必要对机关干部进行一次比較系統的社会主义教育，介紹我国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設的偉大成就和基本經驗，闡明当前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謬論，并进一步提高机关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为深入开展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創造有利条件。因此，决定联合組織社会主义教育报告会，邀請中央負責同志做若干次报告。这些报告受到各級干部的热烈欢迎，普遍要求把报告記錄整理发表，讓大家更深入地进行研究。現分別征得报告人的同意，除各次报告在学习杂志上刊登外，同时汇編成冊，交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以滿足广大干部的要求。

社会主义教育报告会办公室

1957年12月29日

关于我国的肃反斗争，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做了总结。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講演中，又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论述。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是革命问题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对于这个问题是否持有正确的态度，这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根本立场的问题。

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在革命队伍内部，在党内，基本上是一致的。绝大多数同志对中央关于肃反斗争的方针、政策和路线是拥护的。但是，不仅党外有人怀疑、反对甚至攻击我们的肃反运动，在党内也有一小部分人不同意或者怀疑中央关于肃反斗争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在若干原则问题上，例如，中央对于情况的估计是否正确？肃反运动是否必要？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不是小题大做？是不是得不偿失？政策是不是正确？群众肃反的路线对不对？要不要党委领导？对反革命和坏分子要不要继续加强专政？等等，是有争论的或者实际上存在着争论。

一九五七年夏天，由于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对于社会主义，对于革命和建设，对于民主和专政，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辩论。肃反问题是这场大辩论的中心论

題之一。通過這場大辯論，徹底粉碎了資產階級右派對肅反運動的攻擊和污蔑。同時，批判了革命隊伍中的右傾思想，明確了大是大非。這是一場不可避免的嚴重的階級鬥爭，所有的人都受到了考驗和鍛煉。

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為了有助於大家研究肅反問題，也為了回答一些問題和說明一些問題，我將着重就1955年以來的內部肅反運動，講一些實際工作的情況、問題和經驗。同時，也將順便講到社會鎮反的一些情況，提供大家參考。

關於肅反運動的成績

全國規模的內部肅反鬥爭，從1955年6月開始到1957年10月為止，已經在一千八百多萬職工和人員中勝利地開展了運動。經過了兩年半的緊張鬥爭，取得了巨大的成績。這場鬥爭，無論就其廣大的規模和深刻的程度來說，也無論就其偉大的成果和豐富的經驗來說，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都是從來沒有過的。

關於肅反運動的巨大成績，今年7月“人民日報”“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的社論中，已經作過基本的說明。從運動的全過程來考察，成績主要表現在下列六個方面：

第一，運動查出了十萬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其中已經混入黨內的有五千多名，混入共青團內的有三千多名。有不少反革命分子是血債累累、民憤極大的反革命劊子手。這樣的反革命分子在中央國家機關就查出了二百二十多名。殺害李大釗、陳潭秋、毛澤民、李兆麟、羅世文等同志的凶手，

迫害方志敏、王若飞等同志的特务、反革命分子，都被清查出来了。运动中还破获了一批重大的和長期沒有能够查清的疑难案件，破获和查清了一批政治破坏事故和破坏嫌疑事故，查出了三千六百多名利用各种伪装埋伏下来和新派遣进来的現行特务分子。肃反运动的实践証明，我們各个战綫和几乎所有的工作部門都被混入了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不少反革命分子混入了我們的内部，有些确实是鑽到我們的“肝臟”里面来了，并且已經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当了县級以上各种领导干部的就有二百六十名。从革命队伍内部清查出十万多个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这究竟是坏事还是好事呢？当然是一件极大的好事。我想凡是站稳了階級立場，分得清大是大非和敌我界限的人，都不难作出这样正确的回答。

第二，运动还清查出六万五千多名普通的反革命分子、各种反动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另外，还发现了九千多名反革命嫌疑分子，揭发和处理了反动小集团三千个。由于揭露了这些人的政治面貌，批判了各种反革命言論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打扫了机关内部的某些阴暗角落，这就从政治上組織上进一步純洁了革命队伍。許多机关單位正气上升，邪气下降，政治空气濃厚了，劳动紀律加强了，牢騷怪話和各种事故減少了，工作效率有了显著的提高。

第三，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反革命分子内部的分化和瓦解。肃反运动的强大威力，加上广泛的政策宣傳，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促使反革命分子紛紛坦白交代，低头認罪。运动中，自动坦白交代的反革命分子大約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即

二万名左右；稍加触动就坦白交代的大約占百分之二十五，即二万五千名左右。反革命分子不断分化和瓦解的結果，就使肃反斗争出现了空前有利的形势，运动前进的障碍扫除了，运动做到了又好又快又省。

第四，运动查清了一百七十七万多人的政治历史問題，其中問題严重的近十三万人。经过运动，我們内部許多長期背着政治历史不清的包袱的人，因为坦白交代或弄清了問題，都放下了包袱，靠攏了組織。他們对党表示了万分的感激，心情舒暢愉快，許多人都說“等于政治上洗了一个干淨的澡”。因为他們提高了階級覺悟，同反革命划清了界限，积极参加了肃反斗争，就进一步分清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間的兩类不同性質的矛盾，更加孤立了反革命。同时，肃反运动使党組織对干部的政治面貌和历史情况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有力地推动了审查干部的工作。許多單位的肃反工作，一方面清查了反革命和坏分子，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起了审查干部的作用。

第五，运动深刻地教育了群众，使革命队伍的全体人員都受到一次深刻的生动的階級斗争教育，提高了識別暗藏反革命的能力，提高了社会主义覺悟。广大群众参加肃反斗争的热烈場面，为历年的肃反斗争所罕見。全国檢举反革命的材料多至二百多万件。全国有專职肃反干部七十五万多人，还有上百万个肃反积极分子。全国参加外出調查研究的达三百二十八万多人次。那些原来政治上处于中間和落后状态、敌我界限模糊的人，在这样一場严重的敌我斗争中，由于亲眼看到了用兩面派手段伪装起来的反革命分子的真面目，他們的政

治覺悟提高了，敵我之間的界限明确了。因为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参加肃反斗争的自觉性提高了，不少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虽然费尽心机，躲藏到天涯海角，也未能逃出人民的法网。

第六，运动发展了我党领导肃反斗争的经验。经过这次肃反运动，我们的经验更加完全了。我国肃反工作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早在1942年延安审干运动的时期，就已经奠定下来了。但是，延安时期的经验，还是比较不完全的。这次运动，使我们党和广大群众又受到一次深刻的锻炼，得到了更为丰富的经验。我们国内反革命已经不多了，但是还有反革命，还有阶级斗争，国外还有帝国主义，肃反斗争的经验，不仅现在有用，将来也还有用。

我国肃反斗争的巨大作用，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做了肯定的评价。毛主席说：“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动荡，但是没有引起什么风浪。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页。）从毛主席这个历史性的论断中，我们可以认识到，镇压剥削阶级分子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反抗和破坏，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乃是直接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彻底解放群众，解放生产力，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革命措施。

肃反运动的巨大成绩证明了，开展这样一次群众性的肃反运动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因为，在全国胜利以后，我们党

的組織、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和經濟机关在接收工作人員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我們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們靠攏，其中魚龙混杂，泥沙俱下，我們还没有来得及作彻底的清理。同时，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总是采取兩面派的欺騙手段来进行破坏活动，而要識別和清理暗藏的反革命，只有依靠領導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干部的高度觉悟相結合才能办到。过去，我們在这方面的的工作是有缺点的，我們的很多人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警惕性不高，很多人簡直丧失了警惕。当着1955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前夜，国内阶级斗争趋于尖銳，国际反动派加紧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顛复活动，我們内部这种严重的情况，就暴露得十分明显了。如果我們不集中进行这样一次广泛而深刻的肃反运动，党和国家就处在数以万計的暗藏反革命的經常威胁之下，反革命分子就有可能在他們認為有利的时机，在党和群众缺乏准备的情况下，随时給我們以突然的襲击。这样，我們的党，我們的国家，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就是不巩固的，我們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沒有安全的保障。

資产阶级右派根本否定肃反运动的必要性和巨大成績。他們硬說我国肃反斗争犯了扩大化的錯誤。这是一种沒有絲毫根据的污蔑，必須加以严正的駁斥。肃反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績，已經完全証明了，我国的肃反斗争是一次偉大的成功的运动，根本没有什么扩大化可言。我国肃反运动是在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遵照正确的方針、政策和工作路綫进行的。运动一开始，毛主席就提出了“提高警惕，肃清一

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正确方针。1956年，当运动进到了深入阶段和扩大战果、巩固成绩的时候，又提出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著名原则。我们贯彻执行了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实行了群众肃反的路线，采用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我国的肃反斗争，从来就是坚决反对和禁止逼、供、信、乱捕、乱杀、神秘主义、孤立主义等等的错误作法的。资产阶级右派所叫嚣的肃反扩大化，实质上就是根本不要肃反。在他们看来，只要我们搞肃反，就是扩大化；只有不搞肃反，把反革命保留下来，他们才称心满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之间的分歧，是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反映了敌我之间的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谁如果站不稳立场，分不清大是大非，那么，他就一定要犯严重的错误，以至掉到右派的泥坑里去。

资产阶级右派又硬说我们发动肃反运动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当然应该反对。但是，右派分子要反对的并不是什么教条主义，而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们企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普遍真理，以便放肆地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从思想上解除革命队伍的武装。列宁对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曾经有过许多深刻的论述。他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中说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乃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当这个时代还没有结束时，剥削者就不免还保存有复辟希望，而这种希望就变为企图复辟的行动。……他们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

之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热情，增長百倍的仇恨心來拚命鬥爭，以求恢復他們已被奪去的‘天堂’，以求保護他們從前過着多么甜蜜生活……”。（“列寧文選”兩卷集第2卷，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49頁。）我國肅反鬥爭的方針和任務，正是我黨中央和毛主席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正確地分析了我國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形勢以後提出來的，完全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右派分子反對肅反，實際上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社會主義，他們同反革命是一派，他們主張實行的是地主、資產階級專政。右派分子在肅反問題上的猖狂進攻，難道不恰恰說明過渡時期階級鬥爭仍然是十分尖銳的這個普遍真理的正確性嗎？難道不正是說明肅反鬥爭恰恰是十分必要的嗎？

關於缺點和錯誤

說到这里，會有人出來說：難道你們就沒有錯誤嗎？我們說，當然有錯誤，有些錯誤還比較嚴重。但是對錯誤要分析，要弄清錯誤的性質，研究產生錯誤的原因和檢驗我們對待錯誤的態度。縮小錯誤不好，夸大錯誤也不好。

什麼是我們發生過的錯誤或者缺點呢？就兩年多的整個運動過程來看，概括地說，有表現為右的錯誤，也有表現為“左”的錯誤。

在運動發動之前，我們隊伍中的許多人，由於滿足於已經取得的勝利，對於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階級鬥爭認識不足，因而喪失了對於共產黨人極為寶貴的政治警惕性，在革命隊伍

內部发现了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的思想言論，或者熟視无睹，或者不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一种极端錯誤、极端有害的右傾思想。为了动员全党和全体人員展开肃反斗争，党曾經严格地批判了这种右傾思想。

当斗争已經发动，运动进入高潮以后，即在1955年秋天，大約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在一些地方和單位的小組斗争中，曾經发生过若干“左”的偏向。斗争的面寬了一些，斗錯了少数好人，并且在一小部分小組中发生过打人、罵人的現象。运动中也錯捕过极少数好人。这些“左”的錯誤，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在一部分群众中产生过对肃反工作的若干怀疑，甚至有一小部分人暂时地对党产生了比較深的隔閡，給运动帶來了一些副作用。这种“左”的偏向，时间比較短。我們及时地进行了休整和檢查，采取了一系列的糾正措施，进行了善后工作，因而迅速地得到了糾正。

这些“左”的錯誤，当然造成了損失，但我們必須研究产生的原因，損失的大小和是否可以弥补。在斗争中，发生上述“左”的偏向，当然是有原因的。主觀上的原因是，調查研究不够充分，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对某些政策界限交代得不够清楚，組織控制还有不够严密的地方，有些錯誤糾正得还不够及时或不够坚决。同时我們虽然有过延安审干运动的經驗，又有过全国胜利以后进行清理中內层的經驗，但是，拿这些經驗来指导全国規模的、斗争更加深刻的肃反运动，毕竟还是不够的，况且有些历史經驗并没有完全为广大干部所接受。加之，在客觀上說，敌人是隱藏的，斗争是复杂的尖銳的。这次运动

又是由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直接发动的，运动进展迅速而猛烈，一时各项工作都赶不上，特别是材料的调查研究工作赶不上。因此，我們虽然避免了許多錯誤，避免了犯全局性的和不能弥补的錯誤，但我們沒有也不可能避免所有的錯誤。

这就是我們犯过了的“左”的錯誤，也是右派分子攻击得最凶的所謂錯誤。但是，我們相信，只要把問題摆出来，冷静地客觀地加以分析，弄清問題的性質，并且把道理切实講清楚，許多不明真象不懂得全盤情况的人，是完全可以做出公正的判断的。就是那些在肃反斗争中受过某些委屈的好人，当他們懂得了全盤情况和明了了肃反斗争的意义以后，或者当我們向他們誠懇地賠礼道歉并当众恢复了他們的名誉之后，他們最終也是会諒解的。

我們还有另一方面的錯誤，这就是1956年春天以后出現的情况，即在很長時間、很多地方的右傾松勁。右傾的主要表現是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漏掉了反革命分子，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該斗不斗，該定案不定案，草率結案，草率下降，該处分不处分，該捕不捕，該判不判和重罪輕判。1957年各地复查出漏掉的反革命分子有九千多名，該判不判和重罪輕判的有一千多名。

我們有些思想右傾的同志，本来右了，还是在講“左”了，本来已經判輕了，还講判重了，本来是應該捉还没有捉，还说捉錯了捉多了，本来是敌我矛盾，硬說是人民內部矛盾。一部分政法工作的干部，他們在工作中只注意檢查輕罪重判的偏向，不注意檢查重罪輕判的偏向；对肃反运动強調錯誤缺点，

低估成績优点，甚至根本怀疑运动的正确性。总之，有些同志反“左”劲头十足（如果真有“左”的錯誤，当然应当反，也必须反），反右却很不起劲。对“有錯必糾”很感兴趣（应该感兴趣），对“有反必肃”却不大关心。他們不了解右傾帶來的危害并不比“左”傾帶來的危害小一些。“左”的錯誤，当然是不好的，但是我們已經堅決地做了糾正。右的錯誤，把反革命分子保留下来，把反革命漏掉，一时似乎看不出影响，实际上却埋藏着极大的危險，就好象在我們身旁安置了定时炸彈一样，随时都可能給我們以突然的严重的伤害。

肃反斗争中的右傾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意味着对于社会主义的敌人，对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不是实行專政、惩办和改造，而是包庇、寬容和放縱。归根到底，要就是巩固无产阶级專政，要就是削弱无产阶级專政；前者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人民的，后者是不利于人民，不利于社会主义，而仅仅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敌人的。問題的實質只能是這樣。

当然，應該說清楚，無論我們犯过的“左”的或右的錯誤，从整个运动来看，都是暂时性質和局部性質的錯誤，都沒有損害运动的偉大成果。而且，經過反右派斗争，肃反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錯誤，糾正得更加細致也比較彻底，善后工作也做得更加恰当。缺点錯誤糾正了，也就更加巩固了成績。所以就整个运动說，仍然用得着而且必須坚持这样的公式：“肃反是必要的，成績是主要的，缺点錯誤是次要的，而有些缺点錯誤，还是难于完全避免的。”

严肃地对待缺点和錯誤，这是我們党的一貫方針。毛主席

席說：“我們的肅反工作，成績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錯誤。過火的，漏掉的，都有。”“在肅反工作中，凡是已經發現了的錯誤，我們都已經採取了或者正在採取糾正的步驟。沒有發現的，一經發現，我們就準備糾正。原來在什麼範圍內弄錯的，也應該在什麼範圍內宣布平反。”（“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5頁。）我們過去這樣做了，如果還有錯誤沒有糾正，或者今後又發生了什麼錯誤，我們還要繼續這樣做。但是，在糾正缺點錯誤的時候，我們同樣應當遵守毛主席的指示，不要向廣大幹部和積極分子潑冷水，而要幫助他們。因為在實際工作中發生的許多錯誤缺點，同我們領導工作中的某些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是分不開的，因此應當首先由領導上擔負責任，而不應當不適當地過多地責怪下面。我們必須保護幹部和群眾的革命積極性。

在這裡，還有兩種錯誤議論，需要加以批判。

有一個議論說：“成績固然不小，但錯誤很大，得不償失。”這個論點，是完全站不住腳的。請問，失掉的究竟是一些什么呢？所謂失掉的無非是在某些單位中鬥爭面寬了點，傷了點感情，但這是可以糾正的，而且已經糾正了。我們得到的是查出了十萬個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查清了一大批人的政治歷史問題，是廣大群眾受到了鍛煉，保障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鞏固了人民民主政權。肅反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也可以說是一種代價。既要肅反，就不能不付出一些代價。如果不肅反，讓反革命猖狂活動，我們將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呢？